



·教学参考·

浅析郑观应的“商战”之说

吴弘明



郑观应(1842年—1921年)是晚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,是揭开民主与科学序幕的启蒙思想家。广东省香山县雍陌乡人。他一生经历过第二次鸦片战争、中法战争、甲午中日战争、八国联军入侵等国难和国耻。郑观应17岁那年,因家庭经济负担较重而到上海学习经商。他在上海的叔父是洋行买办,为他打下一定的英文基础。郑于1860年充任英商宝顺洋行的买办,为多获薪水而苦学英语,从中接触到西方的政治与实业之学。他关心时局,并从事著述。1874年郑观应转任英商太古轮船公司的买办。1882年出于挽回利权的爱国之心,脱离待遇丰厚的太古船行,就任中国轮船招商局帮办,后升为总办。除此职务之外,从80年代起到1921年病故之前,曾历任上海织布局、上海电报分局、汉阳铁厂、开平煤矿局广东分局以及粤汉铁路总办等职。郑观应在协助办理洋务期间,深入调查研究,崇尚西方的民主制度与科学技术,积数十年丰富的实践经验,形成了完整的维新思想体系。其思想核心是“富强救国”,其代表作则是1894年刊行的《盛世危言》。

《盛世危言》中专门设有“商战”一篇。“商战”是郑观应经济思想中的精髓。他在外国洋行中的买办生涯长达20余年,而在官督商办的企业中又供职近40年,可说是精通实业、知己知彼之人。他的“商战”学说,既言之有物,又切中时弊。“商战”的中心思想为三部分。一、学习兵战,不如学习商战;二、列举洋货倾销的危害;三、为赢得商战所献之策。对于第一点他的论据是,清政府的洋务派鉴于两次鸦片战争接连失败,而镇压太平天国却赖洋枪、洋炮和洋船而取胜,因此有意购买或仿造外国的武器,按照西洋方法训练军队,以期反抗列强的侵略,平定国内人民的暴动,最终维护并巩固封建专制政权。于是购置铁甲舰、建炮台、造枪械、制水雷、设海军、操练陆军、研究军事不遗余力。郑则不以为然,他认为列强不是为同中国打仗而来,其目的是借战争或和平的手段进行经济掠夺,把中国变成它的市场和投资场所,赚

取最大利润。等到中国资源、财富滔滔外流,国弱民穷时,则不费一兵一卒之力就能把全中国变为他们的殖民地。因为用武力并吞中国,极易引起人民的警觉和抵抗,而经济入侵则和缓、隐蔽,不易觉察。对列强而言,为征服中国只有从经济入手,也就是进行商战才是上策。郑观应深知商战的厉害,针锋相对地提出“习兵战,不如习商战”的主张。他曾说:“初则学商战于外人,继则与彼外人商战”,可见倡导商战的主张是他学以致用的结晶。

对于第二点,即洋货倾销之害,郑观应首先分析了进口洋货和出口土货的商品结构,然后得出贸易差额不利于中国的结论,并找出造成贸易逆差的原因。他把外国商品分作食物、用物及杂物等三类。食物一项,以鸦片为大宗,每年使我国耗费白银3300万两,其他还有药品、烟、酒、肉、糖、干鲜果、咖啡等;用物则以棉纱、棉布为主,每年约共耗银5300万两,另有绸、缎、毛呢、文具、洋火、洋油等日用品;杂物包括电气灯、自来水、照相器材、玻璃、五金、钟表、仪器之类。总之,制成品中以消费品居多,生产资料甚少。郑评论说,上述商品都是凭借不平等的协定税则畅销各通商口岸,并分售内地。他还告诫说,洋人置备家业的原则是去旧换新,卖给我们的商品多是已经或即将更新换代之物,正是以这类东西换取了我国无数钱财。这就是外国人擅长商战所取得的成效。知人之后,更应知己,郑看到我国的出口优势历来依靠丝和茶两项,其次是皮货、草帽辫、药材、绸缎和瓷器等,还靠劳务输出换回部分外汇。在丝、茶贸易盛行之时,丝的出口值为4000余万两,但现因意大利、法兰西和日本货物的竞争,已下跌到三千七、八百万两;茶的出口值原为3500余万两,今有印度、锡兰、日本货的排挤,已降低为1000万两。他对进出口值加以比较后指出:以上三大宗外汇收入的总和仍不足以抵销购入鸦片和洋布的支出,如加上其他洋货,便出现数千万金的贸易赤字。更为严重的是,洋商在同中国交易时,以本国成色不足的银元买

我等价之货,已使华人暗中吃亏;外人以洋钱兑换白银时,则抬高洋价,换我标准的纹银,又使我方明受剥削。这就是中外商战中,金融所起的作用之一。郑观应就此推论道,长此以往,中国将耗尽民脂民膏,变成弱不禁风的病夫,即或船坚炮利,又怎能饥寒交迫的士兵对敌作战呢?从而证明“习兵战,不如习商战”的道理。

对于第三点,即向当局进献赢得商战的对策。他首先讲明工业和商业的辩证关系,即对外通商必须有工业的帮助。因为手工业品或原料借助机器,粗笨者可变得精巧;进料加工,可照外国消费者的需要制为成品,然后反销该国以获取外汇。如果只重视商业而轻视工业,即令物产十分丰富,只出口初级产品,就会把利益让给外人。由此可见,郑观应早已懂得机器的生产效益、加工增值以及工农业产品间的不等价交换。既要振兴工商业,行政管理机构及其人员至关重要,因为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唯其是赖。为此建议朝廷设置商务大臣并兼管工艺,担任大臣的人应有经济方面的专长,大公无私,为官清廉;在民间则仿照西方由工商界推举富商和巧匠作为董事,将要办的事情上报商务大臣,如果大臣损公肥私、用人唯亲,便可直接禀告军机处转奏皇上,这样就能下情上达,毫无阻隔。筹建的商务局其职能应是,考核工商业的成绩,举办优秀商品展览会,勉励精益求精,嘉奖高超的技能。

商业有了工业的辅助、政府的支持,下一步就是如何与洋货争胜。郑提出十项具体的措施。一、重振丝和茶两大行业,废除厘金(水陆要冲各关卡对往来商品所抽的通过税,其税率为值百抽一),多设缫丝厂,夺回被印度和日本货所占的外国市场。开放种植鸦片的禁令,免征厘税,以抵制进口鸦片。这样就能对抗洋药(1858年海关税则改称鸦片为洋药)的入侵。二、拿一省作试点,多买新式织布机,自行织造各种布匹,有了经验然后逐省推广。这样就能用国产布战胜洋布。三、购办机器织成毛呢,并用来制做衣物;熔炼沙石制成玻璃器皿;提炼铜矿仿制钟表。成品既有同类洋货的外观,且又价廉耐用。这样就能战胜外来的用物。四、种植甘蔗和葡萄,以便制糖、酿酒。这样就能战胜进口的食物。五、用北方野生蚕丝和棉花纺纱;栽种香花以制造香水和肥皂等物。这样就能战胜零星洋货。六、开采五金和煤矿,自炼铜、铁。这样就能战胜国外的五金。七、自产煤油和火柴。这样就能战胜外洋的日用品。八、整顿瓷器厂,由景德镇照西洋款式制成带有彩绘的细瓷器,运销欧洲。这样就能在国际市场上战胜他

国的珍奇玩物。九、用杭州和南京的纺织技艺,仿织洋绸,行销各国。这样就能战胜西方的零星杂货。十、仿照洋钱的成色和分量,铸成钱币,废除纹银,在世上流通。这样就能战胜洋钱。作为经济建设计划的这十项措施,不仅意在发展民族工业,抵制洋货,减少贸易赤字,还要国货物美价廉能外销创汇。

对于怎样筹集款项来实行十项措施呢?郑观应的看法是“商战为本,兵战为末”。国家数十年来的军费开支不可胜数,政府如能转变旧有的观念,把财力用于商战上,不但能保持和平而且军民安乐。但最终取得商战的胜利,关键要靠振兴工商业的政策,这种政策应该包括:保护工商业的法规;创办工艺学堂,聘请欧洲的能工巧匠为师,督促学生进步,学成之后,薪水从优;由政府资助发明创造,并使新产品享受专利权。对在国内销路畅旺的洋货,要鼓励仿造,免除厘金,货价必较原货为低,何难实现国产化;对国外必需的中国货,要精心制作然后高价售出,更要减轻税收来拓展销路;对关系民生的进口货,要施行低税以扩大来源;对可有可无的洋货,要加倍征税抽厘以免财源外溢。商战须要政府和商民齐心协力才能获胜。郑观应虽强调商战的重要性,但也未忽略兵战的力量。他所说的“商战为本,兵战为末”,是对立统一的,商战的胜利导致财富的增加,而反侵略的战争须有物质基础,才能增强战斗力,克敌致胜。

该篇最后引用日本如何取得商战胜利的实例,进一层论证“习兵战,不如习商战”的观点。郑观应说日本不过东海中一小岛国,但自明治维新以来,学习西方,奋发图强。官方注意到进口货对本国经济利害兼有的两面性,因此对洋货的品质加以研究,先是招商集股筹措经费,然后建厂仿制,并给予厂商优惠政策和自主经营权,并多方扶持而绝不侵害其利益。于是自行生产的绒布等商品,不但能满足国内需求,而且可供出口,更把该国仿造的洋货售与中国。郑观应还把两个时期的日中贸易额作一比较,以说明日本对华商战的成功。成功之因在于政府用关税来鼓励出口而限制进口。日本人吸取西方善于经商的经验,择善而从。我国何不顺应时势,打破常规转而学习日本,但不是邯郸学步,而是去其缺点而取其优点。我国地大物博,人多财广,超越日本自当易如反掌。只要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,革故鼎新,国必富足,兵必强大,到那时日本再也不敢轻启战端了。商战如能制胜,何愁兵战不胜。由此更加证实“习兵战,不如习商战”这一论点。

郑观应的商战理论并不局限于经济范畴,他认清了朝廷政治上的腐败,官督商办名义上是保护商

人利益,实际上是独断专行、非亲不用、剥削商人。所以他极力主张立法,以法治代替人治。他说:“宪法乃国家之基础,……政治关系实业之盛衰。政治不改良,实业万难兴盛。”郑还认识到商与工、人与物的相互关系,他说:“论商务之原,以制造为急,而制造之法,以机器为先,……宜设专厂制造机器”。又说“器者末也,人者本也。”当然这里的“器”内涵颇广,既指兵器,也指机器,还指交通及通讯工具等。但他把人看作最主要的因素。他所谓的人是指技术和管理人材,也就是从事商战必不可少的人才。但人材不能从天而降,所以就提倡教育。“商战人材,无一非出自教育,教育为立国之本,国运之盛衰系之,国步之消长视之”。郑观应的商战学说和治国思想是以他半个多世纪的经济活动、由买办转为商业资本家的历程、他在洋务派官僚和工商业者之间承上启下的地位、长期参与对外商战的经验、以及结合国情学习西方的心得作为根据的。他所创立的振兴实业、争取商战胜利的理论,具有反对封建专制、鼓吹科学与民主、反抗列强经济侵略的色彩,在当时思想界是较为先进的。但其思想也有历史的局限性,主张改良政治,而不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(姑且

不论有无可能),没有洞澈封建专制与帝国主义既相矛盾又相勾结的本质,以为只要奏请朝廷采纳其利国利民的条陈,就能使中国繁荣富强。在清末的国际和国内情势下,这只能是一种空想。郑观应不愧为一位先觉的思想家和热烈的爱国主义者,这是无人怀疑的。

用今天的眼光去评价郑观应的商战学说,他所提倡的发展民族工商业、反抗外国经济入侵、反对政治腐败、重视教育的思想,仍有现实意义。而他鼓吹的贸易保护主义虽在当时是积极的、进步的,但现在却会妨碍国际贸易的开展,对人对自己都有不利的一面。在学习外国的经验上,郑认为不应盲目模仿,而应舍其所短从其所长。在开办三资企业时,勿忘权由我操,勿使利权外溢,正如郑氏所言:“……太阿倒执。非但事多吃亏,且恐噬脐莫及!”在选用行政管理方面,其人须是“平日公中体国、廉洁自持、长于理财、无身家之念者,方胜厥任”。综上所述,郑观应的商战理论是值得参考和择取的。

(作者单位:天津社科院历史所)

海峡两岸史学家合撰中华民族史 第二次学术研讨会在海南举行

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中旬,「海峡两岸史学家合撰中华民族史第二次学术研讨会」在海南岛举行,来自大陆与台湾、香港及新加坡的学者共四十余人参加了会议。会议听取了中华民族史研究会会长史式教授关于《中华民族史》编撰情况的汇报外,还就以下问题取得了共识:一、中华文明的起源不是「黄河母亲」的一元论,也不是「江、河并重」的二元论,而是「满天星斗」的多元论。二、台湾的高山族的主要族源是远古百越的一支,其断发、文身、凿齿的习俗与远古古人一致;河姆渡的有段石磬经舟山的定海传入台湾,再传至南洋各岛,从出土文物中已有线索可寻。三、《中华民族史》有如邱吉尔的《英语民族史》,完全可以跨越国界,记载遍布全世界的海外华人的活动。在目前《中华民族史》只能暂时写到辛亥革命之时,海外华人部分却可以一直写到二十世纪之末,独立成书。

会议在海口举行会议后,进行了广泛的参观考察活动。在对黎族地区考察后,大家在探讨中也取得了如下的共识:一、有史以来,黎族是海南岛的土著,不是外来的移民。二、黎族是远古百越的一支——骆越的后裔,其断发文身的习俗一直保留到现代。三、黎族的未婚男女可以自由往来,婚后「不落夫家」,可以离婚,寡妇可以再嫁,不重男轻女,不歧视非婚生子女,遇有纷争尊重妇女的调解,这一切都说明这支百越的后裔还保留着母系制社会的遗风,是远古百越的活化石。四、就衣冠而言,黎族并不落后,在纺织技术上应是各族中最先进的。元代的黄道婆是在黎族中学会棉纺织技术,才把它传布到中原。「黎锦」一向闻名于世。

会议最后综合各地代表的意见,对编撰《中华民族史》的工作计划作了修改。会议于十二月十六日结束。

(史讯)